

谈文绎史

范仲淹与崞岚东关城

□赵德荣



崞岚古城 赵文君 摄

范仲淹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、文学家，康定年间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，负责西北边境防御西夏事宜。任职期间，他积极推行“修城筑寨、坚壁清野”的防御战略，先后派人修复和新筑了延河河谷沿线堡寨十余处。北宋杨家将后代杨文广当时在延州军中任下级军官，范仲淹与他交谈后，对其才能深为赏识，遂纳入麾下。后来杨文广随狄青出征岭南，征讨侬智高叛军，因战功卓著升任广西钤辖，知宜、邕二州，终成北宋著名将领。

北宋被动的局面，为后续宋夏议和达成奠定重要基础。庆历三年(1043年)，范仲淹调离陕西，出任枢密院副使，“庆历新政”推行失败后，他主动请求外放，宋仁宗遂任命其知鄜州，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。途中范仲淹先后视察了今忻州境内的代县、静乐、崞岚、保德等地，抵达任所后，他将理政重点聚焦强化军备、巩固防御，制定了“修城筑寨、屯田久守”的战略方针，一方面在崞岚、静乐等军事重镇加固城墙，增筑寨堡，构建严密防御体系；另一方面大力鼓励边民垦复农田，以耕养战，实现军需自给。

行垦荒政策，一年间便收获粮食数百万斛，极大充实了边塞军需储备与民生用粮。他还废除酒类专卖制度，允许百姓酿酒售酒，同时鼓励流亡人口回归故里，有效恢复了边境地区的生产生活秩序。为增强边防兵力，范仲淹就地招募青壮年充当弓箭手，协助官军驻防。按照规定，弓箭手每人授田两项，只需缴纳地租，不承担其他徭役，这一政策吸引力极强，仅崞岚草城川一带就有两千余人应募，当年便收缴地租数万斛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些弓箭手兼具农耕与作战双重属性，军事素质尤为突出，成为抵御西夏、辽军的精锐力量。据史料记载，他们后来曾奉命远征西南泸州一带，其强悍战斗力可见一斑。

窑子坡脚延伸至护城河畔；河对岸的大东关则为夯土筑成，与州城水寨形成层层递进的防御格局。这种“跨河联防”的精妙布局，既能充分借助岚漪河的天然屏障阻隔敌军攻势，又可通过两座堡寨的呼应提升防御弹性，形成攻防兼备的立体防线。

如今，在岚漪河北岸的窑子坡脚下，仍能找到一段被民居环绕的堡墙遗址，墙体上清晰的夯土痕迹印证了其古军事建筑的属性。据当地老人回忆，这段遗迹正是小东关堡墙的遗存，当年它一路延伸东至护城河畔，向南直抵岚漪河岸，与河对岸的大东关隔河相望。而大东关至今保存相对完整，堡内街道布局规整，堡墙墙体较高，西墙曾开设堡门洞，与崞岚城东门瓮城隔河对峙。随着现代交通发展，目前已有桥梁横跨岚漪河连接东关与县城，使得东关区域与崞岚县城融为一体。

一座堡寨，承载着一种精神。东关堡的历史价值远超军事范畴，作为范仲淹推行积极防御战略的具象化体现，其绝非一处简单的军事防御工程，还代表着一场“以城养民、以民固边”的治边鲜活实践。他筑起的不仅是抵御西夏、契丹铁骑的坚固屏障，更是边民“有田可耕、有城可依”的生活希望，最终留给后世的，也不仅是城墙砖石的物质遗存，还有“民为邦本”的治边智慧。

千年岁月流转，崞岚境内的岚漪河依旧静静流淌。在东关堡残存的堡墙上，仍有孩子们在老榆树下诵读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千古名句。风拂过树梢，仿佛还能听见范仲淹当年巡边的马蹄声回响——那是一位儒臣对家国的铿锵承诺，更是这座古堡穿越千年对历史的深沉回答。

书香一品

历史散文的写作，容易游走于两极：或强调史料的真实，少了文学的灵动；或追求故事的新奇，过度消费历史。杜卫东的历史人物散文集《在历史的岸边遥望》(作家出版社出版)尝试平衡二者，既注意历史真相的还原，又努力展示人物的精神世界。

作者紧紧抓住人物的“魂”，所有细节描写、故事铺排、主旨升华都围绕这一点展开。刘禹锡是“虽百折而不悔”，《永恒的精灵》写他屡受打击、历经磨难但不改初衷，直到生命之幕将落时仍不忘亮剑，“天与所长，不使施兮；人或加讪，心无疵兮”，对永贞革新的失败表达不甘。其余篇章中，立志收复失地是陆游之魂，坚守民族气节是傅山的魂，以和亲之身承载家国大义是王昭君的魂。

这些历史人物与天地对话时豪气云天，与时势搏斗时孤愤难耐，虽常以失意收场，即便陆游，也有过被贬回乡的迷茫与困顿，但这绝非向命运妥协，而是另一种方式的抗争。他们在艰难困苦中表现出的坚韧、执着和追求，汇聚成一束不屈不挠的精神之光。

为了情感表达需要，作者赋予自己对话的“特权”：向李清照隔空发问，和洗夫人秉烛夜谈，邀黄遵宪举杯共饮，与刘禹锡纵论古今。对此，读者并不感到突兀，恰恰随之抵达现场，走进人物内心。在《向天而歌》一章中，黄遵宪出任首任驻日参赞，正值日本实行明治维新之时，他写下《日本国志》为中国变法提供参照，希望通过官方渠道尽快刊行，不想，先后被李鸿章和张之洞冷落。作者为黄遵宪鸣不平：“你饱读诗书，熔中西文化于一炉；遍观世界，揽世界风云于眼底……可惜，一腔热血无处洒，青鸟未至，鬓已霜。”走进书中还原的历史情境，读者能深切感受到黄遵宪的抱负与愤懑。

作者还经常通过营造意象，赋予人物诗意的深度。《向天而歌》的“歌”，寓意不屈的民族尊严；《巨灵一臂数中原》的“巨灵”，指代民族复兴需要仁人志士支撑……意象的运用，使散文突破单一的叙事维度，给读者更充盈丰沛的精神体验。

在作者笔下，女性历史人物的命运同样波澜起伏。一代巾帼英雄洗夫人，在关键时刻屡屡出手，使海南岛不曾脱离祖国母亲的版图。赵明诚夜逃逃跑的懦弱，反衬李清照“生当作人杰”的担当。王昭君也摆脱了无奈远行的传统叙事，作者通过对历史细节的搜寻和逻辑推演，揣度昭君出塞的所思所想。

《在历史的岸边遥望》里的13篇散文，在岁月的皱褶中挖掘精神火种，让历史人物通过深情的文字得以重现。读罢全篇，读者能够依稀感受到，13个人物共同指向的是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的民族魂魄，更是引领华夏文明绵延不绝的精神火炬。

深情遥望 诗意对话

——评散文集《在历史的岸边遥望》 □任启亮

探源撷趣

古诗中晋人之性格

□薛平

文化是一个地方的根脉与灵魂，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与内涵。文化资源往往体现原生态地方的文化特征和历史进步的活动痕迹，主要包含物质形式和非物质形式两种，既有地域特色，又有人文价值，如风景名胜、文学艺术、传记传说、民俗物产、历史遗迹、地域文化等。对于有形的文化资源，如历史文化遗产，是不可再生、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，承载它们的文物不会说话，但是文物背后所蕴含的历史价值、文化价值、审美价值以及所赋予的时代价值、所折射出的民族性格，需要我们去挖掘。

考古发现西侯度遗址有用火的痕迹，说明山西地区曾是原始人类繁衍生息的集中地带。山西也是黄河文明的摇篮、华夏民族的重要发祥地，表里山河，是一座历史博物馆。从唐虞虞西周初年立国开始，到春秋末年韩赵魏瓜分的几百年间，虽有变迁，但始终不出河东地区，以河东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民族农耕文化，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分。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，中原华夏民族同北方戎狄民族文化的交汇融合，是纵贯始终的一根主线。民族文化交融从来都是具有双向性的：一方面，北方民族文化逐步全面融入中原民族文化，呈现出被称作“汉化”的主流趋势，由此推动了北方各民族社会的发展进步；另一方面，北方民族文化也不断为中华民族文化输入新鲜的血液、增添鲜活的生命力，由此造就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开放性格和气势恢宏的博大胸怀。

山西而言，以河东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民族农耕文化、以雁门文化为代表的戎狄民族游牧文化相映生辉。通过商贸交流、移民垦边、民族融合等方式，不断与蒙、满、回等民族加强交流，促使北方游牧民族与汉族相互融合。在多元并蓄的地域文化浸润下，山西民风淳朴、温和敦厚，人民形成了勤劳俭朴、忠勇坚毅、自强不息、诚实守信、勇于开拓、为人直爽、热情开放、团结互助的民族性格和精神气质。

刘绶芬在《三晋文化的特质》中讲：“贵在真淳轻华丽、崇尚务实不虚玄，是三晋文化的又一特色。三晋大地，土瘠民穷，其俗朴质、敦厚，作为展现人们心态的文化，也就绝少艳丽、淫靡、纤巧、娇柔之习。”这种特有的民族性格可以从晋地晋人的古诗词中感受到，《诗经》中的《伐檀》《硕鼠》就是关于山西的诗歌。通过诗歌，可以把内心坚忍的意志、高亢的情绪以及内敛的性格等表达出来，如先秦《击壤歌》“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。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”，宋代《卿云歌》“四时从经，万姓允诚”。

此外，王绩《野望》“相顾无相识，长歌怀采薇”，李世民《谒并州大兴国寺诗》“对此留余想，超然离俗尘”，王昌龄《送柴侍御》“青山一道同云雨，明月何曾是两乡”，王维《登河北城楼作》“寂寥天地暮，心与广川闲”，裴度《中书即事》“有意效承平，无功答圣明”，皆抒发了节操的正直和隐忍的无奈。白居易的《初入太行路》“若比世路难，犹自平于掌”，体现的是山西人不畏艰险的坦荡胸襟。而宋代沈

与求的《山西行》“山西健儿好身手，气如车轮胆如斗。十五射猎少年场，戏格黄黑同拉朽”，曹端的《题夷齐庙》“清风播宇宙，大义立乾坤”，读罢一股浩然正气喷薄而出。

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是“诗言志，文载道”，且诗不但要言志，还要有寄托讽喻之意。薛瑄在官邸影壁上自题“有雪松还劲，无鱼水自清。沅州银似海，岂敢忘清贫”以明志；傅山晚年作《乘烛》：“乘烛起长叹，奇人想断肠。赵鼎真足异，管婢亦非常。醉起酒犹酒，老来狂更狂。研剩余一笔，何处发文章。”这些诗句皆表现出晋人无畏、坚韧、坦诚、图强的精神以及豁达大度、潇洒自如、悲天悯人的民族性格。

无论诗词的意境是开阔、博大，还是深婉、韶秀，无论是“语尽意不尽”，还是“语简而意深”，它们都是对所处时代的感悟，表现的不仅仅是文人风骨，更多的是一种集体具象化的特征，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晋人性格。

谈文绎史

亭子中的古人生活

□樊克唯

有人说，亭是中国建筑物中无实用价值却又最为奇巧的空间。确实，亭子是中国文人独属的小巧建筑，也是中国古代建筑中形制与功能保留最为完整的建筑类型之一。亭以有顶无墙为基本特征，造型变化多样。明代造园家计成在我国第一本园林艺术理论专著《园冶》中写道：“(亭)造式无定，自三角、四角、五角、梅花、六角、横圭、八角至十字，随意合宜则制。”亭的功能、造型，随着时代更迭而不断变化。

《说文解字》释“亭”，“民所安定也”，汉代刘熙《释名》以“停训‘亭’”，认为亭是文人停歇聚集的场所。亭子出现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，最初用于军事防御，因需容纳士兵宿营生活起居，早期的亭建筑体积较大且多建在高处，形似堡垒。亭子依功能分为“旗亭”“市亭”“都亭”等。亭还是秦代地方一级行政区划，汉高祖刘邦早年就是沛县泗水亭长，相当于村一级行政长官。

设置在交通要道的亭，效同驿站，作邮递、停歇之用，亦称“邮亭”“驿亭”“亭传”。汉代之后，官用驿站“亭传”逐渐被更为常见的“路亭”取代。民间交通要道、村口或路旁均设亭，江边也设渡亭，以备旅人停歇之用，或是作别亲友、迎接宾客的特定场所。南京市栖霞区幕府山东北角，坐落着“万里长江第一矶”的燕子矶，是古代重要渡口，此处有名亭矶顶亭。康熙、乾隆下江南均泊舟于此，在亭中观金陵盛景“燕矶夕照”，乾隆还题书“夜晚登临，



兰亭修禊图

水月皓白，澄江如练”。

早期亭子是四方形木构建筑，常以草或瓦为顶。随着时代发展，亭子的形式与构造，依据功能和周围环境需求变得复杂多样。亭子从双层、以高台为基、近似于楼的建筑群组，转变为单层单体建筑。园林与皇家苑囿的亭多有围栏或窗，可供居住或宴请宾客之用。亭的建造材料多取茅、竹、木、石，苏州拙政园尚存之前主人所建造的茅亭，在山水花园众亭中傲然独立，表达园主淡泊之志。亭可建于竹林，亦可在山巅，位置依据地势环境灵活选择。《园冶》中写道：“花间隐榭，水际安亭，斯园林得致者。惟榭只隐花间，亭胡拘水际。通泉竹里，按景山颠。或翠筠茂密之阿，苍松蟠郁之麓。”

魏晋至隋唐，亭子的建造数量激增，一度达到了“无园不亭、无亭不园”的程度。据《水经注》与《洛阳伽蓝记》记载，最早在园林中出现亭是北魏时期，此时社会动荡，战争频发，佛

教盛行，文人雅士向往自然，寻求心灵解脱，产生了返璞归真的思想。隋唐之后亭子的发展，极大拓展了这一建筑的空间功能，《宋史》中载，宋徽宗“叠石为山，凿池为海，作石梁以升山亭，筑土岗以植杏林”。在皇家趣味影响下，士大夫群起效仿，建造了众多园林景观。文人士大夫逐渐参与到园林的修建当中，亭卸下防御与驿站的实用功能，开始转向供人来往停歇、观赏游玩的精神功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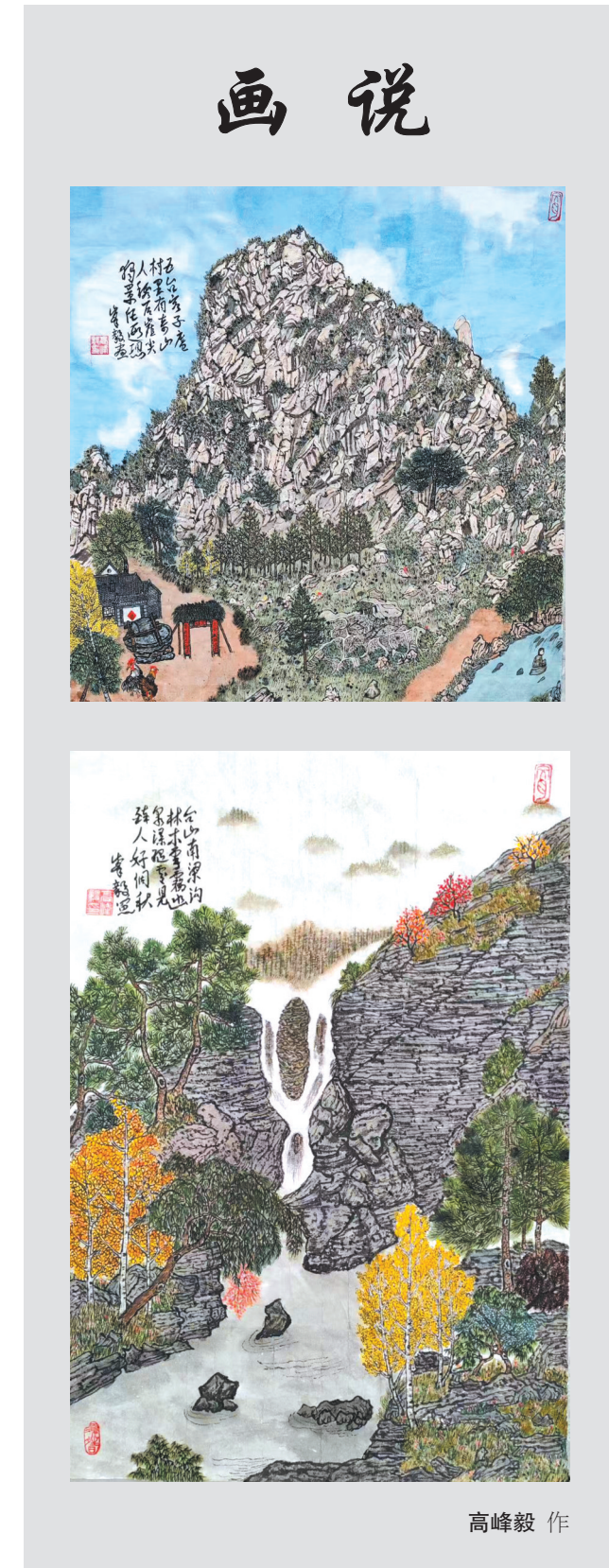
与陂渚、江河、竹林、枯石相结合，增加了亭子的社交礼仪、宴饮游赏功能，自此亭子开始成为中国文人与雅集文化的建筑符号。由文人、画师参与的园林，主要是为了放松身心而建，此时的亭子建筑多有风雅之意，供文人士大夫游赏赋诗之用。白居易《闲居自题》诗中云：“波闲戏鱼鳖，风静下鸥鹭。寂无城市喧，渺有江湖趣。”在他的洛阳履道里别业，修建了中岛亭、琴亭，还有乐童于中岛亭中奏乐，极尽风雅。

自宋代起，商贾或官宦常邀请好友、文人、画师于亭中雅聚，作饮酒、和诗、品茗、抚琴的风雅活动。《亭引》中收录了百余篇亭记，其中就有王羲之《兰亭集序》、欧阳修《醉翁亭记》《丰乐亭记》、苏轼《放鹤亭记》等。刺史欧阳修

与民同乐：“俯仰左右，顾而乐之。于是疏泉凿石，辟地以为亭，而与滁人往游其间。”亭成为他表达人生追求、人格志向的物象，而亭记描述的内容也已远超建筑物本身。亭子的存在不仅是为观景、停歇、雅集，文人的喜好与情感，也让亭子逐渐成为一种显著的文化符号。

在中国山水画中，亭子是文人雅士寄托情怀的载体，是营造画面意境的符号。山水画面中点景亭子多为独立建筑，与远山、幽林、小桥及浩渺湖水相映衬。如李公麟、文徵明等人以王羲之兰亭集会为精神内涵所作的《兰亭修禊图》，北宋赵士雷《荷亭消暑图》，明代沈周《东庄图》《容膝斋图》，以及清费丹旭《湖亭雅集图》等。费丹旭的《湖亭雅集图》以近处大量留白来强调视觉中心，即雅集之亭与亭内所发生的事，亭内可见五人，根据题跋，画中一人人为亭中雅集的召集者，官至广西知府的黄子湘，还包括画家费丹旭本人，其友康甫、秋韶、滋伯等。他们有人凭栏交谈，或三两相对沉浸式观景，亭外一童子怀抱物品而行，似乎在给亭中之人送玩赏的书画或家藏之物。

画中之亭看似是建筑，实则也是文人精神栖息之所。古人爱亭，在于亭子可作为人与自然沟通交流的媒介，其顶为天，基为地，柱似人，人人亭便与自然成为有机体，亭中人乐于其中进行交游活动、驻足远眺。亭子独特的建筑结构 and 开阔的视野，扩大了驻足之人的情感空间，让人在有限的空间里容易对宇宙无限生出丰富联想。



高峰毅 作